

新經濟社會學的知識計劃：鑲嵌命題的爭議及其反省（下）

吳鴻昌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摘要 本文試圖反省作為新經濟社會學主導性概念的鑲嵌命題。首先，我透過三個吊詭問題的提問，具體化鑲嵌命題在概念化經濟行動、經濟體系、經濟學對經濟實在的“干預”所遇到的理論困境。其次，為了解開此一理論困境，我進一步重置了鑲嵌命題所立基的兩條知識軸綫：一是從舊經濟社會學到新經濟社會學的學科知識脈絡的轉折；二是鑲嵌概念的知識系譜。一方面，透過學科知識脈絡的重置，我指出了上述的理論困境乃根源於新經濟社會學的自我學科定位中。另一方面，透過鑲嵌概念的知識系譜，我考察相關理論的進展與困境，尋求上述困境可能的出路。最後，為了完備新經濟社會學的知識計劃，本文結合上面兩方面的考察，以定位出可能的重建方向。

第四部分 鑲嵌概念的知識系譜與相關轉折

在前面的第二部分，我們指出了當新經濟社會學主張“經濟行動鑲嵌在社會關係裡”的命題時，卻意外地導致了新經濟社會學對於經濟行動、經濟體系、經濟學的干預效果的概念化不足的現象。通過第三部分的考察，我們考察了這三個理論吊詭在學科發展過程的由來。在這個部分，我們將進到鑲嵌概念的知



識系譜，考察相關理論發展的“承繼與位移”，以及由此而來的困境與出路。¹

然而，在進入新經濟社會學相關理論發展的討論前，我們必須從鑲嵌概念的理論源頭Polanyi的理論與困境談起。² 從事後回顧的角度來看，很諷刺的是，如同經濟社會學新舊對立所導致的“理所當然”與“似是而非”，上述鑲嵌命題所引發的三個弔詭問題，卻早在Polanyi的相關理論中就可以發現。Polanyi的著作不但涉及市場到底是“去鑲嵌”還是“鑲嵌”的爭議，也涉及了對於市場相關意識型態的反省，同時，也考察了伴隨這樣意識型態興起所帶來的社會後果。因此，底下的討論，我們將先由Polanyi相關的理論命題談起。接著，參照Polanyi鑲嵌概念的貢獻與侷限，我們將回顧在新經濟社會學中鑲嵌概念的知識譜系，特別是Granovetter從“鑲嵌命題”到“經濟的社會建構命題”的轉折，以及White的“市場從網絡中迸生”命題、Fligstein的“市場的構造”命題，以及Callon所提出“經濟是鑲嵌在經濟學中”的“表現性”命題等，相關的“經濟的社會建構”的理論發展。透過上述的回顧，我們希望可以反省鑲嵌概念相關理論的進展，對於解開三個的弔詭的貢獻與侷限。

一 Polanyi的理論及其困境：弔詭的双重鑲嵌

由Polanyi所引發的市場體系到底“鑲嵌”或“不鑲嵌”的問題，無論在經濟史、經濟社會學、經濟人類學內部都引發了很大的爭論與誤解。³ 正如Block與Somers所指出的，Polanyi理論是相當複雜的，往往也引起許多的誤解，要理解Polanyi的鑲嵌概念，必須回到《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書中對於十九世紀市場社會的雙元運動（自由放任的自律市場打造與社會自我保護的社會管制）的歷史考察，並重視Polanyi基本的理論關懷，乃是為



了打破陳舊的市場心態的經濟主義謬誤。⁴ 因此，底下我將透過鑲嵌概念、雙元運動與市場心態等三個層面，討論 Polanyi 的相關理論，為後續鑲嵌概念的相關討論，定位出基本軸線。

Polanyi 的鑲嵌概念：“經濟作為一種制度過程”命題

基本上，Polanyi 的理論核心乃是“經濟作為一種制度過程”的命題，並由此提出了“經濟乃是鑲嵌在社會之中”的想法。⁵ 然而，後人的詮釋，往往過於注重鑲嵌與否的爭議，忽視了鑲嵌概念所立基的理論前提。因此，要釐清相關爭議，我們必須回到鑲嵌概念原來的語意的脈絡。

在《鉅變》一書的第五章討論市場模式時，Polanyi 先區分了四種基本的經濟行為模式（家務、互惠、再分配與市場交換），並指出市場交換不過是一種特殊的經濟行為模式，市場經濟則是鑲嵌於更大社會脈絡中。接著，他進一步指出，相較於其他三種模式，“市場交易模式”的特殊性在於，一方面它有“目標特定的交易動機”與“功能特定的制度”，另一方面，基於強而有力的“交易動機”，“市場模式”能夠將孤立被管制眾多的市場，連結成一個市場經濟體系，一個自發調節的市場體系，進而取得壓倒性的力量，將整社會的運作從屬於市場機制，導致“社會關係被鑲嵌於經濟體系”取代了原來的“經濟體系鑲嵌於社會關係”，這將對整體社會組織產生致命的後果。⁶

簡言之，Polanyi 的基本立場是經濟作為一種制度過程，乃是鑲嵌於經濟與非經濟的制度中，有著包括市場交易在內的四種基本的行為模式，而市場交換模式的特殊性在於其強大的交易動機與功能特定的制度，這導致一種可能的危險：一旦這種模式取得了壓倒性的支配地位，企圖形成所謂的“自我調節的市場”，將導致可怕的社會災難。然而，上述 Polanyi 的思考，卻存在著內在的難題：Polanyi 似乎沒有說清楚到底存不存在有所謂自我調節的



市場？如果市場可以是自律的與去鑲嵌的，那麼 Polanyi 為何又主張經濟作為制度過程是鑲嵌在經濟與非經濟的制度中？如果市場無法自我調節的，必然鑲嵌於社會之中，那麼對於市場社會的形成，Polanyi 又為什麼要感到憂慮呢？要解開這樣的困惑，就必須討論 Polanyi 所謂形構了十九世紀市場社會的雙元運動。

市場社會的雙元運動

所謂的雙元運動的命題，乃是 Polanyi 所觀察到的，西歐現代化過程中所興起的兩股力量：一是自從 1830 年代開始，強調自由放任的古典政治經濟學者，開始以十字軍般的熱忱，以一種人為干預的方式，掃除一切妨礙自由市場出現的傳統障礙，試圖通過土地、勞動力的商品化與貨幣自我調整的金本位制度，達成所謂自律市場的出現。另一力量則是：當好戰的自由主義份子，通過各種方式與手段，將濟貧法、穀物法、定居法等有關生產要素自由移動的法律予以廢除，並且有計劃地促成自由市場的貨幣經濟形成，這導致了各種提供社會安全的傳統連帶的破碎，使人們失去文化的參考座標，進而導致個人在文化上的退化；於是，1870 年以後，伴隨著市場經濟的出現，一種社會的自我保護措施興起，以公共衛生、工廠條件、社會保險、工會結社、公共設施等社會手段，為受到創傷的人們提供保護。簡言之，從對歷史的分析中，Polanyi 似乎得出了一種辯證的雙元運動命題：“去管制的自律市場機制”並非是達成資源最適配置的手段，其自身反而是一個有待達成的目標，並且，此一目標乃是難以實現的，只會引發文化與社會的災難，故導致各種自發的社會安全措施得出現。

換言之，Polanyi 已經指出了，在“社會實在”層面上，市場並非是自發而存在的，所謂的市場的自我調節，只存在經濟論述中，市場經濟作為一種實際的社會制度，乃是相關經濟論述經由政策與社會工程的計劃，才得以出現的；倘若這樣的社會工程推



至極端，將會導致災難，因此，社會生活中經濟制度與非經濟制度的關係，構成了市場制度的基本限制。

準此，我們“似乎”可以這樣來理解 Polanyi 的鑲嵌性思考：在社會實在上，市場交易模式的確是鑲嵌於社會之中，“去鑲嵌的市場機制”乃是經濟論述自由放任的“意識型態”，基於這樣論述而生的商品化社會工程，恰恰證明市場制度是需要社會管制才能出現，同時，其他非經濟的社會制度則構成商品化社會工程在社會實在上的限制——意即市場交易是鑲嵌於市場制度中，市場制度又鑲嵌於相關社會制度中。⁷ 這樣的說法，雖然看似釐清了鑲嵌與自律市場的爭議，然而，我必須指出，這樣的“雙重鑲嵌”的命題，內容有過於空洞之嫌，並沒有回答市場交易是如何鑲嵌於市場制度中，市場制度又如何鑲嵌於社會之中？同時，也沒有回答，倘若市場制度是經濟論述對於“經濟的社會實在”的一種社會工程的“干預”，那麼所謂的鑲嵌到底意義為何？如果都必然鑲嵌，那 Polanyi 有什麼好憂慮的，自律市場又怎麼可能引發社會災難？這樣的鑲嵌概念，到底該如何概念化市場交換模式與市場經濟體系，又該如何理解經濟論述的社會工程？⁸

陳舊的市場心態：絕對化的市場觀念

事實上，Polanyi 對市場社會崛起的憂慮，並非在於市場制度是“自律的”還是“鑲嵌的”爭議，而是在於市場社會所立基的經濟文化——所謂的“陳舊的市場心態”。⁹ 他清楚地意識到，這種市場心態乃是西方在現代性時期所產生一種文化觀念，這種文化觀念不但導致唯經濟主義的謬誤，影響了學院論述，更滲透日常生活的語彙與實作哲學之中。這種經濟文化，一方面，強調物質動機才是“真實的”、“理性的”，才是主導日常生活的真正力量；另一方面，則是將人類其他“真實的”社會動機（榮耀、自尊、義務、道德責任等），視之為是“理想的”、“非理性



的”。同時，更將這樣的二分，視為是一種無時間性、放諸四海皆準的區分，進而約束了人們對於社會實在與未來的想像——意即 Bernard Barber 所謂“絕對化的市場觀念”。¹⁰ 因此，在 1940 年代，Polanyi 才會急切地呼籲新的經濟觀念與社會民主的到來。

換言之，Polanyi 上述的說法，清楚地指出了，經濟相關的概念範疇，乃是具有歷史意義的限定與承載，因而，市場經濟不只鑲嵌於社會之中，更鑲嵌於強調“市場絕對化”的經濟文化中。正是這種弔詭的雙重鑲嵌，導致學術論述與日常生活語言語意學上的混亂，這才是真正問題根源的所在。

從事後回顧的角度來看，Polanyi 雖然意識到上述經濟現代性所隱含的弔詭的雙重鑲嵌議題，但是他卻無力與其脫離開來，重新加以概念化分析之。¹¹ 這固然是 Polanyi 的鑲嵌概念之所以引發諸多爭議的根源，事實上，這也是前面我們指出鑲嵌命題的三個弔詭問題的根源所在。然而，此一弔詭的雙重鑲嵌所帶來相關議題的複雜性，卻往往為後來的新經濟社會學相關學者所忽略，這也導致 Granovetter 以降的學者，在構作與修補鑲嵌命題時，遇到了概念上與理論化的困境。

二 Granovetter 的轉向：從“鑲嵌命題”到“經濟的社會建構命題”

新經濟社會學的宣言：鑲嵌命題

如上所述，Polanyi 的鑲嵌概念是經歷過 Granovetter 的修正，才成為新經濟社會學的主導性概念。然而，誠如我們在第三部分所指出的，概念的構作與命題的建構，並非是憑空而生，往往受到相關的論述空間與知識條件的影響，這一點亦清楚地反應在 Granovetter 鑲嵌命題的論述策略中。首先，Granovetter 在 1985 年這篇新經濟社會的理論宣言裡，¹² 開宗明義就否定所謂以自律市



場為前提的現代性、社會分化等相關論點，因而他批判Polanyi以降的實質學派的經濟人類學對於現代自律市場的肯認，進而提出即便在現代社會裡，經濟並非是去鑲嵌的，經濟行動依然是鑲嵌在社會關係裡等主張。

接著，為了區別於舊經濟社會學與回應經濟學帝國主義，Granovetter引入了“低度社會化個人”與“過度社會化個人”的討論，以批評結構功能論與新古典體經濟學對於行動者的預設。他一方面批評Parsons以降的舊經濟社會學，過於重視對於規範、價值、文化的討論，使得行動者有“過度社會化”的傾向，難以解釋行為中衝突、惡意等面向。另一方面，他亦批評主流經濟學原子化個人的預設，錯誤地假設了社會制度、人際關係對於經濟行為影響是不重要的，犯了“低度社會化個人”的毛病。¹³

最後，為了設定鑲嵌命題的基本理論定位，Granovetter選擇以Williamson等新制度經濟學為對話對象。他先指出，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意味著經濟學家也意識到理性而原子化個人的假設是偏頗的，因而，才引入交易成本、有限理性等討論。但是，Granovetter認為即便如此，新制度經濟學從“市場到階序”的討論，不過是Thomas Hobbes秩序問題之“自然狀態”與“鉅靈”(Leviathan)的翻版，依然擺盪於“低度社會化個人”與“過度社會化個人”的兩難。因此，基於這樣的兩難困境，Granovetter認為，應該從理性行動出發，並強調理性行動是鑲嵌於人際關係網絡上，這樣的觀點，既可以保有行動者能動性，亦可以兼顧社會結構(網絡)對於行動所提供的限制等面向。

簡言之，Granovetter建構鑲嵌命題的理論策略，乃是批判舊經濟社會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的原子化個人的預設，並透過批判Polanyi的理論對於自律市場的承認，提出“現代經濟仍然鑲嵌於社會之中”的想法，證成了社會學重拾經濟議題的正當性。此外，他更透過對話新制度經濟學，設定了相關理論發展的議



程：藉由社會網絡版本的社會結構定義，在經濟學理性行動假設的基礎上，強調外生變數的重要性，以建構新經濟社會學的相關理論。

上述 Granovetter 對鑲嵌命題的定位，的確為新經濟社會學打開新的理論格局，也提供新的議題分析與理論建構方向。因而，透過將鑲嵌命題作為學科發展的主導性概念，新經濟社會學得以生根茁壯。然而，在後續相關的理論發展，不少新經濟社會學學者都意識到，這樣的鑲嵌命題，對於經濟學理性選擇具有高度的曖昧性，引發了鑲嵌命題是否該保留典型市場行為，以及鑲嵌命題是否與經濟學共享了效率迷思的爭議。¹⁴ 此外，許多學者也紛紛指出，鑲嵌命題的實質內容有過於空洞的嫌疑。¹⁵ 同時，也有學者意識到，無論是鑲嵌命題，還是其所立基的社會網絡分析，往往有過於形式化與去脈絡化的傾向，無法回答社會網路的性質為何的問題。¹⁶

雖然不少新經濟社會學的學者都意識到鑲嵌命題的不足之處，也都試圖尋找修正方向。然而，他們往往卻都接受 Granovetter 對於舊經濟社會學、Polanyi 理論的定位，以及由此而生的理論構作策略，因而，他們的修正，往往未深刻反省這樣的定位與策略是否有不當之處，也因此相關的反省未能正視鑲嵌命題真正問題的所在——意即如何同時堅守鑲嵌命題，又同時概念化經濟行動、經濟體系、經濟學的干預效應的兩難問題上。

從事後回顧的角度來看，上述的新經濟社會學相關學者，在進行理論的建構時，低估了 Parsons 在發展經濟社會學所遇到的理論困境，也忽視了 Polanyi 所意識到的經濟現代性所具有的弔詭雙重鑲嵌現象，¹⁷ 這導致以鑲嵌命題出發的相關學者，沒有對相關的經濟行動理論予以重建，亦無法發展出對於市場制度的分析，也無法概念化經濟學的干預效應所帶來的社會後果。



“經濟的社會建構”轉向

有趣的是，正當鑲嵌命題逐漸成爲新經濟社會學的主導性概念時，鑲嵌命題的內在困境，卻早已爲 Granovetter 所意識到，因而他也進行一連串的修正，試圖轉向“經濟的社會建構”命題。¹⁸ 在 Granovetter 後續的修正裡，¹⁹ 他仍然企圖維持經濟行動鑲嵌在社會結構的主張。因此，Granovetter 重申，經濟行動在傳統與現代社會的鑲嵌程度，並非人類學家與經濟學家所認爲的全有或全無，在現代性的過渡裡，經濟仍然是鑲嵌的。同時，爲了撇開經濟學理性選擇理論的糾纏，他引用了 Max Weber 的行動理論，將更多主觀變數引入鑲嵌命題中，強調行動者的目的具有高度的混合性，因此，相關經濟議題無法由行動者的動機來詮釋，社會網絡所提供的限制與選擇，才是最根本的解釋因素。

此外，爲了具體化鑲嵌命題的意涵，Granovetter 引入商業團體 (business group) 的概念，強調經濟活動並非由原子化個人發起的，而是必須透過團體的組成與合作才得以可能。而且，爲了解釋經濟制度的創設，Granovetter 援引 Peter Berger 與 Thomas Luckmann 關於“制度乃前人構作但爲後人視爲理所當然”的想法，並且透過對於“如何”問題的追問，考察相關商業團體的組成如何促進制度的創設。最後，爲了彌補鑲嵌命題在制度層次上的理論化不足，Granovetter 進一步將鑲嵌命題區分出“關係鑲嵌”（人際之間）與“結構鑲嵌”（整體關係網絡的結構），並引入 Harrison White 關於連結與脫勾 (coupling-decoupling) 的網絡封閉性與開放性的想法，透過水平信任關係與垂直權力關係的討論，試圖連結微觀到鉅觀的理論構作，以完成“經濟的社會建構”命題。

上述 Granovetter 對於鑲嵌命題的修正，看似完整地彌補了相關理論問題的缺失。然而，Granovetter 理論構作策略，仍然只是透過批判新古典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在相關議題上解釋的缺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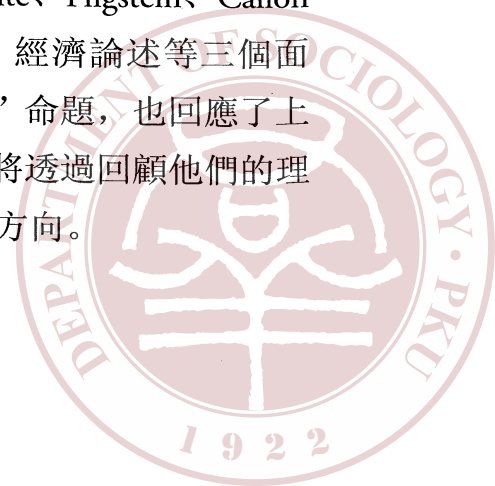


並援引相關事例來加以說明，缺乏真正的理論上的突破與整合。事實上，他對 Weber 行動理論的援引，僅僅只是反駁理性選擇的行動理論，並沒有真正對於相關行動理論予以重建。同時，他對於“水平關係／垂直關係”的區分與“微觀／鉅觀”的討論，亦有著實體化的危險，無法兼顧參與者與觀察者的視角。而且，他對於社會網絡、商業團體如何促進制度創設的討論，更缺乏真正的制度層面關於制度的運作邏輯與制度如何變遷的思考。²⁰

換言之，Granovetter 的經濟社會建構命題，依然只是從外在的觀點來處理經濟與社會的關係，並非內在的討論社會與經濟關係，因此，他的理論仍然無法回答，如果一切都鑲嵌在社會之中，那麼經濟行動是如何可能的？他的社會建構命題，也無法回答現代性的貨幣經濟是如何可能的？經濟現代性的特殊性何在？如果鑲嵌命題成立，那要如何概念化市場經濟作為經濟社會學的研究對象，並討論其可能帶來的社會後果呢？同樣的，這樣的社會建構命題，亦沒有注意到經濟論述的干預效果，所帶來的理論難題。

三 市場經濟的社會建構：White、Fligstein、Callon 的相關理論

雖然，Granovetter 的鑲嵌命題，有著上述的內在理論困境，但是，他對於“在現代性下經濟仍然鑲嵌在社會中”的想法，的確提供了社會學重拾經濟議題的重要起點，他對於“經濟的社會建構”命題的提倡，的確也指出了重建鑲嵌命題的理論發展方向。近來，在市場社會學的相關領域之中，²¹ White、Fligstein、Callon 等人的理論，分別從市場秩序、市場制度、經濟論述等三個面向，一定程度完善了“市場經濟的社會建構”命題，也回應了上述我們指出的三個弔詭。因此，底下，我們將透過回顧他們的理論，進一步思考鑲嵌概念可能的重建與發展方向。



市場秩序的迸生：White的“市場從網絡中迸生”命題

說來諷刺，上述鑲嵌命題所遇到的理論困境，卻早已為新經濟社會學與社會網絡研究的理論源頭——Harrison White所認識。早在Granovetter版本鑲嵌命題提出前，1981年White就開始構思“市場從網絡中迸生”的命題。²²基本上，White清楚地認識到主流經濟學乃立基於不當的方法論與理論的前提，錯誤地將經濟體系的運作類比為一種機械裝置，同時，也錯誤地將市場予以絕對化，構作了完全競爭市場的神話，導致主流經濟學事實上沒有真正關於市場的理論。²³因此，他試圖透過對話非主流的壟斷性競爭經濟學與信息經濟學，以發展他的“市場從網絡中迸生”命題。

有別於傳統社會網絡分析從結構位置(position)來發展相關理論，White更重視從參與者視角(廠商)，將網絡視為是稜鏡(prism)的理論思考起點。²⁴因此，他的“市場從網絡中迸生”命題，其基本意涵在於，處於生產競爭網絡的廠商，透過將想像的“總和消費者”視為一種鏡屏(screen)，並藉此一鏡屏(即所謂的需求面)，廠商們進行相互鏡射與監控，定位出彼此各自的生產計劃，隨著生產計劃的確立，廠商逐漸衍生出彼此相互定位的“角色結構”，此一“角色結構”，就是所謂的“市場”。

然而，為了兼顧觀察者的市場觀點與參與者的廠商觀點，避免將“迸生”的“角色結構”予以實體化，並進一步理解“角色結構”是如何從實作中一再地“再生產”，並基於這種“再生產”，行動者又如何得以展現其施為(agency)，White進一步從關係論的立場出發，²⁵進行了現象學的轉折與語言學轉向，通過對於更一般的理論議題的思考，來完善他的“市場從網絡中迸生”命題。²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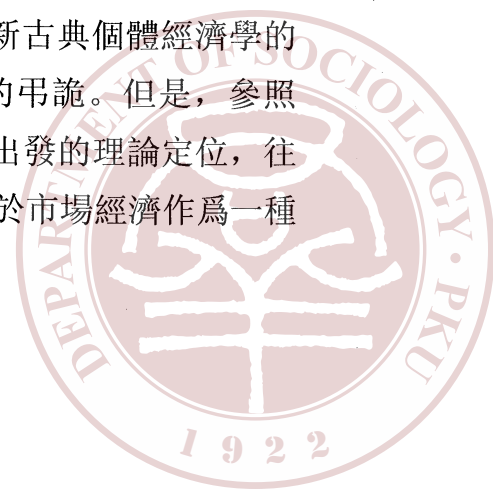
基本上，White認為，在現代性底下，社會生活充滿著各種偶連性(contingency)，人際網絡中會有“鑲嵌—脫勾”(embedding-



decoupling) 的動態。面對這種不確定性，行動者（廠商）彼此會動用各種可能的資源去控制 (control) 這種趨勢，並以所欲控制的“標的物”為鏡屏，行動者之間會展開相互的鏡射與監控。透過此一不斷操作的回饋過程，行動者形成對自我與他人的社會側寫 (social profile)，建構了自我的認同 (identity) 與故事 (story)（角色互動）。為了進一步將此“參與者（廠商）視角的角色互動”與“觀察者視角的社會秩序”（角色結構的市場秩序）結合，White 更透過語言學的類比，進而指出，正是基於此認同與故事的角色互動基礎上，行動者得以援引既有社會文化脈絡，並將其“脈絡化” (contextualizing)，因而，從觀察者視角所看到的角色結構、社會制度等社會組成 (social formation) 的迸生，得以透過此種“脈絡化”不斷地由參與者的實作中再生產。²⁷ 至此，White 透過關係論的立場，發展“市場結構”與“生產行為”相互建構過程的理論，完成了他所謂的“市場從網絡中迸生”命題。

相較於上述 Granovetter 的理論修正，White 的理論解決了“如果一切都鑲嵌，經濟行動如何可能”的難題，也解決如何內在地討論社會與經濟關係。同時，他的理論也處理了社會網絡分析形式（觀察者視角）與實質（參與者視角）的難題（參照於 Parsons 的理論困境），也注意到經濟不止鑲嵌在社會裡，亦鑲嵌在相關認知與文化過程裡（參照 Polanyi 的雙重弔詭鑲嵌）。然而，正如 Karin Knorr-Cetina 所指出的，White 關於生產市場的理論，固然解開了市場秩序由何而生的問題，然而，他過於以生產者的眼光來看問題，並無法在理論上，處理當今市場機制日漸瀰漫的市場社會所可能帶來的後果，以及所引發的相關爭議。²⁸

換言之，White 雖然提供了真正有別於新古典個體經濟學的替代理論，也解開了部分鑲嵌命題所引發的弔詭。但是，參照於 Polanyi 的理論與困境，White 從社會網絡出發的理論定位，往往只將視野集中在組織與互動層次，缺乏對於市場經濟作為一種



社會體系的思考。同時，White 雖將文化與認知因素引進他的理論架構中，但是，卻忽視了經濟論述的干預現象，導致他的市場社會學，實際上無法處理因新自由主義興起所帶來的“市場化”與“商品化”的趨勢。

市場的構造：Fligstein的政治—文化取徑

正如我們前面所指出的，在新經濟社會學內部，除了社會網絡的取徑外，尚存在以組織新制度論為起點的理論取徑。事實上，早在1986年，Sharon Zukin and DiMaggio 就試圖將 Granovetter 的鑲嵌命題擴大為認知、文化、結構（人際連帶）與政治（權力）等四種鑲嵌，提議發展一個從鉅觀制度、組織到微觀行動層次的理論建構，以完善“經濟的社會建構”命題。²⁹ 組織新制度論正是站在這個提議，企圖發展關於“市場的社會建構”的命題，其中的最為完整的乃是 Fligstein 以政治—文化取徑所建構的市場社會學理論。³⁰

為了建構市場社會學的相關理論，³¹ Fligstein 首先駁斥了關於自律市場的相關命題。Fligstein 指出，現代性的特殊性在於現代人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社會組織乃是一種人為產物，現代經濟的所有裝置不過是社會組織技術的後果，人們也越來越清楚看到，人們可以透過新的社會組織技術去達到新的目標（如公司法人的設立）。基於這樣的立場，Fligstein 否定了經濟學關於自律市場等相關主張，強調現代經濟體系的發展，並不是自動就會產生相關的技術、市場制度、社會關係與相關行動者，市場制度的形成乃是與民族國家的建構有著緊密的關連。

延續這樣的立場，Fligstein 接著指出，新經濟社會學要建構市場作為研究對象，就必須從政治過程的角度，同時考量市場制度形成與市場秩序的共生。因此，他認為，必須注意國家的政策場域對於市場制度的形塑，市場制度的相關規則，如財產權、治理



結構、交換規則、“控制思維”(conceptions of control)等，乃是在這樣的場域中產生出來的。而且，他也指出，基於這些規則，結構性的經濟交換（不因此而否定非結構交換的存在），才得以可能。換言之，這些規則正是市場秩序滋生必要的制度條件。

除了指出這些條件外，爲了理解市場秩序滋生的動態過程，Fligstein 援引了 White 關於“市場乃是生產者間自我再生產的角色結構”的說法，並結合相關組織社會學的理論，進一步指出，在市場的生產場域裡，基於不確定性的存在，生產者不可能知道所謂利益最大化的效率手段，只能尋求有效的解決辦法，試圖在競爭的威脅下尋求自我的生存或既有地位的維持。因此，相關行動者會動員一切可能的物質的與象徵的資源（如生產材料、金錢、法律、政策等），去維持或改變既有場域內的權力關係與地位。同時，這樣的權力遊戲將會進一步衍生出場域內部的認知框架與文化慣例（控制思維的象徵支配），以定義並穩定化公司內部與公司之間的社會關係。

換言之，類似 White 的理論，透過生產市場自我再生產的場域理論，Fligstein 解開了“鑲嵌命題與經濟行動如何可能”的難題，³² 並且透過結合國家建構與市場制度形成，以及相關群體的權力遊戲，Fligstein 也彌補了鑲嵌命題與社會網絡取徑對於制度化層次考量不足等缺失。同時，他對於作爲場域文化的“控制思維”的強調，結合對於市場制度與市場秩序的討論，Fligstein 也具體化了 Polanyi 的“經濟作爲一種制度過程”的命題，一定程度完善了市場社會學的理论建構。

然而，我必須指出，正如 Fligstein 以社會建構論的立場所指出的，現代性的特殊性在於人們越來越能夠具有“反身性”的自我理解，理解現代社會乃是人爲的建構，那麼如果現代人的“自我反身性”的理解，被某種論述所扮演的“制度性反思”所支配，



那又該如何？³³ 如果“經濟論述”滲透進現代性的民族國家與市場經濟的打造過程裡，影響了人們的自我理解，產生迴圈效應，那麼社會學該如何概念化這樣滲透的歷程呢？

因此，參照於Polanyi的理論與困境，Fligstein雖一定程度完善了社會學對於“市場的構造”的分析，但是，對於社會建構過程中論述的迴圈效應，Fligstein卻未能給予足夠的正視。³⁴ 因而，他的政治—文化取徑，雖試圖提供有別於經濟學的規範性的建議，並試圖反擊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但是，他卻沒有進一步深化“控制思維”所具有的象徵暴力的“社會煉金術”(social alchemy)面向，³⁵ 因而，他忽視經濟論述的象徵暴力如何影響了日常生活中的經濟語意，進而影響了相關的經濟實作，因而發明了經濟實在。

經濟鑲嵌在經濟論述之中：Callon的“表現性”命題

除了上述兩種市場社會學的取徑外，近來，不少新經濟社會學學者都意識到，在歐陸，從“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的出發，由Callon所發展的“表現性”命題，不但跟社會網絡分析有一定的親近性，同時，亦提供了“經濟的社會建構”過程中關於知識技術方面的討論。³⁶ 因此，底下我們將考察Callon的理論如何處理經濟論述可能帶來的效應。³⁷

基本上，Callon對於“表現性”命題的構作，仍是承繼Granovetter鑲嵌命題而來，但是，他翻轉了相關的提問題視角，企圖將經濟論述作為其研究對象，考察相關的經濟知識技術對於所謂“經濟實在”的構成性效果。透過提問“在市場不確定的狀態下，計算性施為(calculative agency)如何可能”的問題，Callon指出了市場交易網絡乃是一個“糾結物”(entanglement)，往往處於一種物與資訊的溢位(overflow)的狀態，因此，計算性施為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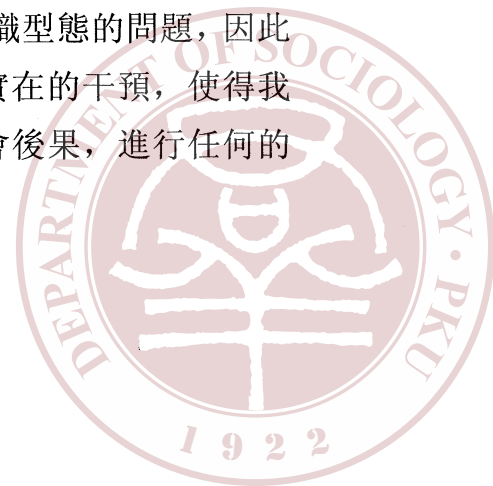


出現，必須透過相關知識技術的構架 (framing)，從而將糾結物拆解 (disentangle)，使得計算施為得以可能，施為者 (agent) 才得以解開聯繫 (ties) 並觀察他人，進行決策與投資，所謂的“市場化” (marketization) 正是這樣的一種糾結與拆解的雙元來回的運動。³⁸

基於上述的論點，Callon 更進一步指出，所謂的“經濟人”指的正是乃是這種“計算性施為”，所以“經濟人”不但真的存在，而且“經濟人”的存在，有賴於相關知識技術的裝備。因此，Callon 大膽地宣稱經濟不是鑲嵌在社會網絡中，經濟是鑲嵌在經濟論述中。這種論述對於實在的“表現” (perform)，正是 Callon 所謂“表現性”的命題。

從這樣的命題出發，Callon 進一步翻轉了經濟學的相關討論範式。³⁹ 他指出，經濟學認為例外的市場機制的外部性（即糾結物的溢位狀態），事實上，才是市場交易的基本前提，理性計算乃是基於此一前提，透過經濟論述與技術的構架，才得以組裝起來的。換言之，Callon 認為，基於溢位的存在，經濟學認為必然發生的搭便車行為並不會常常發生，相反的，正是由於強調理性選擇的經濟論述的處方性指導 (prescription)，搭便車行為才得以可能。因此，基於表現性命題，Callon 認為經濟社會學可以翻轉經濟學理性選擇的討論，並將經濟學與實在的關係，作為研究對象。

簡言之，Callon 的理論，不只注意到經濟論述的干預現象，他更透過將經濟論述與實在的關係，建構成研究對象，⁴⁰ 翻轉了相關提問角度，避免了鑲嵌命題在概念化經濟行動的難題。同時，他的理論，也提供了經濟社會學翻轉經濟學討論範式的有力起點。⁴¹ 然而，正如 Daniel Miller (2002) 與 Don Slater (2002) 所指出的，⁴² Callon 幾乎完全忽視了權力與意識型態的問題，因此他的理論將會完全的合理化經濟論述對於實在的干預，使得我們無法對市場化、商品化等經濟改革的社會後果，進行任何的
分析與評價。



市場經濟的社會建構及其缺憾

參照於鑲嵌命題的三個弔詭，上述 White、Fligstein、Callon 三人的理論，都由關係論的立場出發，解決鑲嵌命題概念化經濟行動的難題。⁴³ 同時，針對市場秩序、市場制度與經濟論述的干預效應等三個層面，這三者的理論，也都分別修補了鑲嵌命題在這三方面的不足。透過比較這三者的理論，我們可以發現，在市場秩序方面，Callon 對於市場秩序的理解，非常接近上述的 White 的看法（Fligstein 則是大致接受 White 的想法）。只是，Callon 忽視了 White 所重視的權力控制的面向，White 則是忽視了 Callon 所正視的經濟論述的干預現象。其次，在市場制度方面，White 與 Callon 都缺乏 Fligstein 所正視的制度面向的討論，忽視了民族國家建構與市場經濟形成的錯綜複雜關係。最後，在經濟論述面向上，Callon 雖最為正視經濟論述的干預現象，但是，由於他缺乏對於權力的警覺與“象徵暴力”的關注，低估了經濟論述如何維持且再製了既有的支配關係（請參照 Fligstien 所謂作為場域文化的“控制思維”）。⁴⁴

簡言之，這三種關於市場的社會建構的理論，雖然尚須相關理論細節更細緻地整合與修補，但是，這三種理論的確都從關係論的立場出發，提供了解開鑲嵌命題內在理論困境的修正起點，也提供了“經濟的社會建構”命題的理論發展方向。同時，一定程度上，這些理論也具體化且修正了 Polanyi 原始意義上的鑲嵌概念。只是，參照於 Polanyi 對於“鉅變”的反思，以及他對於經濟學意識型態與絕對化市場觀念的憂慮，上述相關理論的反省，似乎未能正視現代性底下經濟學所扮演的支配性制度性反思的角色，也未能正視經濟論述的社會煉金術效應，及其所帶來的社會後果。因此，在面對全球化場景下，因市場教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當道，由“自由化”、“市場化”等社會工程所帶來的相



關危機與災難，“市場經濟的社會建構”的相關理論進展，仍然是有所缺憾的。

四 小結：概念系譜的承繼與位移

在上述的討論中，我們從 Polanyi 的理論出發，考察了鑲嵌概念的知識系譜。透過 Polanyi 理論的回顧，我們指出了，Polanyi 雖然清楚地提出了“經濟作為一種制度過程”的命題，也意識到現代性底下經濟雙重弔詭性鑲嵌的存在，但是，他缺乏更清晰的理論語言去釐清這樣的現象。因此，Polanyi 雖然試圖概念化經濟行動、經濟制度與經濟論述的干預現象，但是，他在相關的理論思考上是有所缺失的。

以 Polanyi 的理論與困境為概念系譜的起點，我們進一步考察了後續理論發展的“承繼與位移”。首先，我們指出，Granovetter 鑲嵌命題的建構，在概念化上有所不當，因而引發了前述我們指出三個弔詭的理論難題，同時他也誤解了 Polanyi 的理論關懷與困境，未能正視經濟現代性弔詭的雙重鑲嵌。為了解決鑲嵌命題的相關難題，Granovetter 轉向了“經濟的社會建構”命題。然而，他的後續的理論修正，並未能正視困境真正的根源，因而無力於解決上述的難題。接著，我們回顧了市場的社會建構的相關理論發展。透過 White、Fligstein、Callon 三人理論的回顧，我們指出了，這三人的理論的確提供了“市場經濟的社會建構”命題在市場秩序、市場制度與經濟論述干預效應的理論發展方向，一定程度上也修補了 Polanyi 的理論缺失。然而，參照 Polanyi 對於經濟學意識型態與“市場絕對化”心態的憂慮，上述相關的理論發展，似乎在概念的承繼過程中遺失了這樣的理論關懷。因此，倘若要從鑲嵌概念出發，發展“市場經濟的社會建構”命題，相關的理論建構，必須更正視在現代性底下經濟論述所扮演的支配性制度



反省的角色，同時，更必須考察經濟論述如何透過社會煉金術發明了實在，並帶來怎樣的社會後果。

簡言之，從概念的知識系譜來看，鑲嵌概念的構作，乃是不滿於經濟學對於自律市場的強調而出現的。然而，相關的理論命題建構，卻在否定自律市場的同時，往往未能正視現代性底下“市場經濟不只鑲嵌在社會之中，更鑲嵌在強調市場絕對化的經濟文化裡”此一弔詭現象，因而，相關理論的發展，難免令人感到缺憾。這樣的缺失，似乎也關連到在第三部分我們所指出的，在現代性底下“經濟學理性”與“經濟理性”的混淆，“經濟／社會”與“經濟學／社會學”這兩組關係在概念與語意上的錯綜複雜的關係。由此，我們或許可以結合新經濟社會學的學科發展脈絡，以及鑲嵌概念的知識系譜，進而思考新經濟社會學與鑲嵌概念可能的重建的方向。

第五部分 結論

一如我在導言所指出的，本文的研究目的是為理解，以鑲嵌命題為主導性的新經濟社會學，為何會在經濟學與社會學的關係上、經濟與社會的關係上、市場社會崛起的相關議題上，產生了若干理論上的困境與缺憾。為了具體化此一困境，我透過三個弔詭問題的提問，指出了新經濟社會學在理論建構上的三個缺失：一、以鑲嵌命題出發的新經濟社會學，僅僅從外部地去處理社會網絡對於經濟行動的關係，這將導致鑲嵌命題只是經濟學理性選擇的社會學修正版本，並無法提供真正的經濟學替代理論。二、鑲嵌命題的相關理論，僅由外部處理社會與經濟的關係，無法內在地理解經濟乃是社會體系的一環，因而無法概念化市場經濟在系統層次上的運作，因此也無法考察經濟現代性的社會後



果。三、鑲嵌命題無法同時將經濟學作為對話對象與研究對象，考察經濟論述的干預效應及其後果。

簡言之，鑲嵌命題在概念化經濟行動、經濟體系與經濟學的干預效應上，遇到了理論的內在困境。然而，如我們前面所論證的，這樣的難題並非僅僅只是對於鑲嵌命題進行更細緻的修補，就能獲致解決。相反的，要解開上述的難題，就必須考察鑲嵌命題所立基的兩個知識軸線（從舊經濟社會學到新經濟社會學的知識轉折，以及源自於Polanyi的鑲嵌概念），重置新經濟社會學學科發展的知識脈絡與鑲嵌概念的知識系譜，探究相關理論困境的由來與出路。

基於上述，在第三部分，我們回顧了新經濟社會學興起的學科脈絡。通過對於舊經濟社會學到新經濟社會學相關知識轉折的考察，我們指出了，1970年代以降，基於學院外的新興議題，以及學院內部的後Parsons時期的論述空間的轉型，透過社會網絡分析與新組織社會學的結合，並伴隨相關的學術社群與學院建制的支持，新經濟社會學得以在區隔於舊經濟社會學與經濟學帝國主義中定位自己，並逐漸在1990年代邁向穩定的發展。Granovetter的鑲嵌命題之所以成為新經濟社會學的主導性概念，正是由於鑲嵌命題最為清楚地具體化這樣的知識特性（當然，也必須考慮Granovetter在推動新經濟社會學穩定化所扮演的角色）。然而，我們也指出了，由於新經濟社會學對於自身所興起的知識條件與論述策略，往往過於理所當然，對於舊理論的批判亦往往似是而非。因此，新經濟社會學雖試圖重新估量經濟與社會的關係、重新定位經濟學與社會學的關係，但卻意外地掉入了舊經濟社會學相似的理論困境—混淆了“經濟學理性”與“經濟理性”，低估“經濟／社會”與“經濟學／社會學”這兩組關係在概念與語意上的複雜性，輕忽了上述的混淆所導致在研究對象的建構上、方法論的警覺上、意識型態的反省上的理論難題。



在第四部分，我們進入鑲嵌概念的知識系譜的考察。類似於對於舊經濟社會學的輕忽，我們在這個部分也指出了，新經濟社會學並未真的正視 Polanyi 在鑲嵌性思考上的貢獻與困境，這導致以鑲嵌命題出發的相關理論發展，不但無法解決鑲嵌命題的內在困境，亦無法產生出真正有別於經濟學關於市場經濟的替代理論，也無法概念化經濟學的干預效應所帶來的社會後果。針對此一困境，Granovetter、White、Fligstein、Callon 等人，都試圖轉向了“經濟的社會建構”命題。然而，相關理論的發展，雖然立基於關係論的立場，部分克服了鑲嵌命題的內在理論困境，提供未來理論發展的起點與方向，但是，“經濟的社會建構”命題的發展，卻往往忽視了 Polanyi 對於經濟現代性與經濟意識型態的關懷與憂慮，因而也忽視了經濟論述亦是新經濟社會學所欲分析的“經濟的社會實在”的一部份，忽視了經濟論述在現代性下所扮演的支配性制度反思的角色，忽視了經濟論述所具有的象徵暴力的社會煉金術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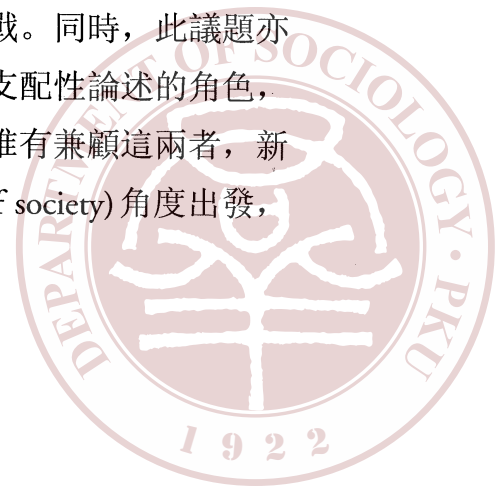
結合上述兩部分的考察，我們可以發現，新經濟社會學的鑲嵌命題乃至於社會建構命題的理論困境，並不在於未貼緊經驗事實，或是忽視某些重要的經驗現象（雖然這些問題可能是存在的）。相反的，其真正的問題乃在於過度急切地去擁抱經驗議題（如重拾經濟議題的社會分析），卻未能對於自身的知識構作條件與策略予以反省（意即社會學分析的首要難題，並不是經驗現象，而是社會學自身的偏頗與誤認，上述的新經濟社會學在批判經濟學帝國主義與舊經濟社會學中定位自己，明顯地凸顯了這一點）。同時，對於市場經濟此一研究對象的建構，新經濟社會學亦低估了此一研究對象所具有的複雜性，忽視了此一研究對象的歷史與社會的系統性形構，亦忽視了相關經濟論述對此研究對象的象徵意義的包裹（意即社會學分析不只應該注意實在的歷史形構，也應該注意概念的歷史承載，更應該注意實在與概念在歷



史進程中的關係，上述的絕對化的市場觀念、經濟論述的制度性反思角色與象徵暴力的社會煉金術，清楚地指明了這一點）。

因此，倘若要堅守鑲嵌性的思考，完備“經濟的社會建構”此一知識計劃，新經濟社會學的未來發展，應該正視下面三個課題：首先，在研究對象的建構上。新經濟社會學不能僅僅滿足於指出經濟論述與社會學事實的“落差”，並以此為己的理論“利基”。相反的，新經濟社會學應該正視經濟論述亦構成了社會實在的一部份，追問上述的“落差”如何在相關社會實作中被忽視、掩蓋與自然化，因而無法為相關參與者所認識，並追問相關的場域與參與者具有什麼樣的特性，此“落差”的代價又是由誰支付？也唯有重視此一經濟論述的社會煉金術機制與後果，新經濟社會學才能妥善地回應新自由主義所標榜的市場化、自由化等政策，如何改變了相關經濟與非經濟的社會制度與實作，又引發了怎樣的社會後果與災難？⁴⁵

其次，在方法論的警覺上。新經濟社會學若要完備“經濟的社會建構”命題，不能僅僅將分析的視野，停留在互動、團體、組織等層次上，必須更正視總體經濟現象的制度性形構。其中，特別是基於貨幣制度而衍生出的信用、金融等虛擬經濟的運作，這些不但是當代經濟議題的重要性所在，更是新經濟社會學介入經濟全球化與市場社會爭議的關鍵。⁴⁶ 然而，如何從關係論的立場與社會再生產的角度，概念化溝通媒介、制度與制度之間的關係、制度的規則與邏輯、制度的變遷等經濟體系的系統運作，兼顧參與者與觀察者的視角，避免實體化的誤置，並注重這些系統性的運作對於一般社會關係帶來的鑲嵌、脫勾、再鑲嵌等動態影響，將會是新經濟社會學在分析上的一大挑戰。同時，此議題亦關乎上述指出的經濟學在經濟議題所扮演的支配性論述的角色，以及經濟論述的社會煉金術機制及其後果。唯有兼顧這兩者，新經濟社會學才能從“社會的理論”(theories of society)角度出發，



避免虛假的學科新舊對立，將相關理論關連到古典社會學與當代社會學理論的發展，⁴⁷ 進而從社會建構論的角度，完善了社會學對於現代性下市場社會興起的分析。⁴⁸

最後，在意識型態的反省上。新經濟社會學在提出鑲嵌性思考作為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论“利基”與貢獻的同時，似乎更應該正視經濟是如何“去鑲嵌”的，“去鑲嵌”的心態與論述是從何而來？強調“自律市場”的經濟學理性，是如何跟日常語意的經濟理性混淆與錯置的？此一問題，不僅僅涉及到西方17世紀以降的經濟現代性的逐步成形，也涉及此一過程中，強調“市場絕對化”的經濟文化的形成。因此，不只鑲嵌與否此一議題需要爭議，關於經濟、市場、利益、理性等概念，都需要進一步釐清其歷史意義的承載與相關的“社會想像”。⁴⁹ 也唯有如此，新經濟社會學才能釐清經濟論述如何在現代性底下取得支配性制度反思的角色？如何走向規劃性色彩強烈的社會工程？如何殖民日常生活的經濟語意？如何在西方與非西方社會引起災難性的後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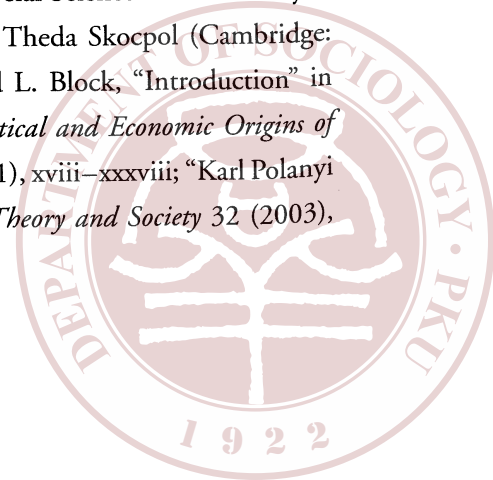
注釋

- 1 爲了釐清相關理論的爭議與複雜性，必須特別注意“鑲嵌概念”與“鑲嵌命題”的區別。所謂的鑲嵌概念或鑲嵌性思考，乃是經濟社會學的基本共識，其立論基礎乃是參照於經濟學的“絕對化市場觀念”，其概念系譜的源頭主要是來自於Polanyi。所謂的“鑲嵌命題”，乃是Granovetter由鑲嵌性思考出發，經由相關論述策略的設定，所建構起來的理論命題。因此，大多數新經濟社會學家，對於鑲嵌概念的理解，主要是基於Granovetter版本的鑲嵌概念。此外，我們也要提醒，不要混淆詞語(word)與概念(concept)，許多論文對於Granovetter鑲嵌命題的援引，並不見得真的正視此一命題的基本理論意涵與相關論述策略的設定。同時，許多相關的理論雖不見得使用“鑲嵌”此一字眼，但是基本上仍是具有鑲嵌性思考的觀點，例如如舊經濟社會學的Parsons，雖然發展了經濟與社會的分化理論，但是Parsons仍然強調這兩者之間的相互滲透(interpenetration)（請參考Jens Beckert, “Interpenetration Versus Embeddedness: The Prem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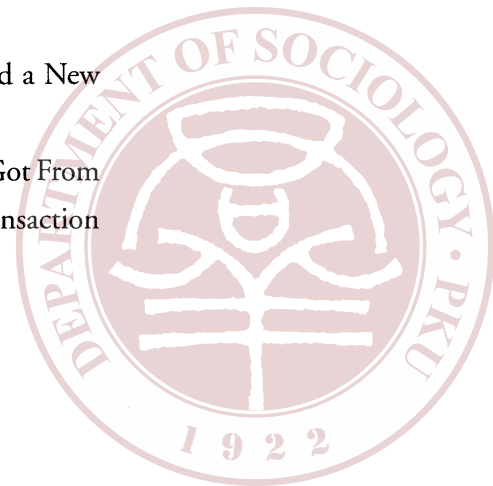


Dismissal of Talcott Parsons in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65 (2006), 161–188), 以及後面將會提到的鑲嵌概念系譜的相關理論，雖然他們可能甚少使用“鑲嵌”此一字眼（如 Polanyi 與 Fligstein），但是，他們的討論，仍是由鑲嵌概念出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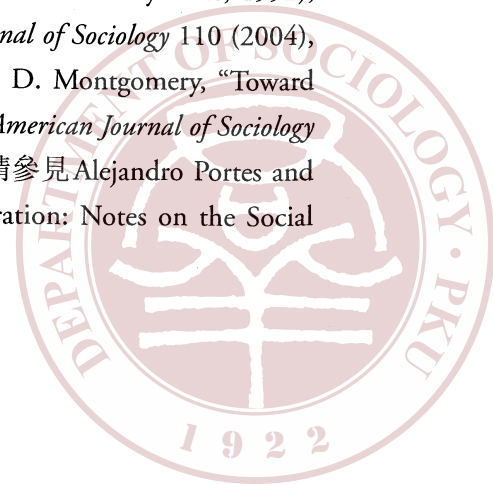
- 2 以鑲嵌命題為主導性概念的新經濟社會學，除了必須受到 Parsons 與後 Parsons 時期的論述空間與學科定位的影響外，在鑲嵌概念的構作上，亦承繼了來自 Polanyi 的鑲嵌概念所建立的知識系譜（雖然經過了 Granovetter 的改造）。然而，必須提醒的是，Polanyi 對於當時的舊經濟社會學，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力，兩者對於經濟學也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Polanyi 相關理論的主要影響範圍，乃是在經濟人類學與經濟史。
- 3 雖然，本文無法在此處理相關經濟人類學與經濟史的討論，但是，我可以指出，正是由於 Polanyi 的鑲嵌概念，在經濟人類學內部引發了實質論與形式論的爭議，經濟史的爭論，則是爭辯 Polanyi 所謂“市場經濟不存在古代、古代經濟是乃是鑲嵌的”等說法，請參見 S. C. Humphreys, “History, Economics, and Anthropology: The Work of Karl Polanyi,” *History and Theory* 8 (1969), 165–212; Douglass C. North, “Markets and Other Allocation Systems in History: The Challenge of Karl Polanyi,”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6 (1977), 703–716。基本上，經濟人類學的爭議與經濟史的爭議，一定程度都誤解了 Polanyi 的論點。Polanyi 主要的關懷，乃是以現代自律性市場經濟的命題做為反省的起點，試圖借用歷史或人類學的研究來選擇不同的參照點，以釐清現代市場心態的所導致的經濟主義的謬誤（後會詳述）。然而，由於 Polanyi 缺乏更有力的理論語言與方法論上的反省，導致他在《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書裡，實質命題與形式分析、道德判斷與理論論證往往都混淆在一起，因而引發了許多誤解，例如 Michael Hechter, “Karl Polanyi’s Social Theory: A Critique,” *Politics and Society* 10 (1981), 399–429; John Lie, “Embedding Polanyi’s Market Societ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4 (1991), 219–235; Santhi Hejeebu and Deirdre McCloskey, “The Reproving of Karl Polanyi,” *Critical Review* 13 (1999), 285–314。關於對這些誤解的澄清，請參見 Karl Polanyi, *The Livelihood of Man*, ed. Harry W. Pears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Fred L. Block and Margaret R. Somers, “Beyond the Economistic Fallacy: The Holistic Social Science of Karl Polanyi,” in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ed. Theda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47–84; Fred L. Block, “Introduction” in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2nd edi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xviii–xxxviii; “Karl Polanyi and the Writing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32 (2003),



- 275–306; Margaret R. Somers and Fred L. Block, “From Poverty to Perversity: Ideas,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over 200 Years of Welfare Debat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0 (2005), 260–287.
- 4 Fred L. Block and Margaret R. Somers, “Beyond the Economic Fallacy: The Holistic Social Science of Karl Polanyi,” in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ed. Theda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47–84; Fred L. Block, “Karl Polanyi and the Writing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32 (2003), 275–306.
 - 5 Karl Polanyi,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in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ed. Mark Granovetter and Richard Swedberg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29–51.
 - 6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 7 從這樣的立場來定位並澄清 Polanyi 的相關理論，請參見 Fred L. Block, “Introduction” in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2nd edi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xviii–xxxviii; “Karl Polanyi and the Writing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32 (2003), 275–306.
 - 8 雖然 Block 與 Lie 等人都試圖修正與澄清 Polanyi 的論點（Block 是提出“市場性”的看法，Lie 則是透過交換模式的重建），但是，他們往往仍只是將經濟論述當成是錯誤的意識型態，忽視了經濟論述與實在的迴圈效應，導致無法對經濟論述的社會工程予以理論化分析，並引發一種兩難：一是強烈地批判經濟論述，卻無法解釋這些意識型態的由來，以及這些意識型態如何產生作用；或者，一旦企圖以經濟論述的干預效應為研究對象，卻會意外地承認“自律市場”與“經濟人”是可能存在的。Block 關於“市場性”的說法，請參見 Fred L. Block, *Postindustrial Possibilities: A Critique of Economic Discour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關於 Lie 的對 Polanyi 的修正，請參見 John Lie, “Embedding Polanyi’s Market Societ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4 (1991), 219–235; “The Concept of Mode of Ex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1992), 508–523; “Visualizing the Invisible Hand: The Social Origins of ‘Market Society’ in England, 1550–1750,” *Politics and Society* 21 (1993), 275–305.
 - 9 Karl Polanyi, “Our Obsolete Market Mentality: Civilization Must Find a New Thought Pattern,” *Commentary* 3 (1947), 109–117.
 - 10 Bernard Barber, “Absolutization of the Market: Some Notes on How We Got From There to Here,” in *Constructing the Social System*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3), 217–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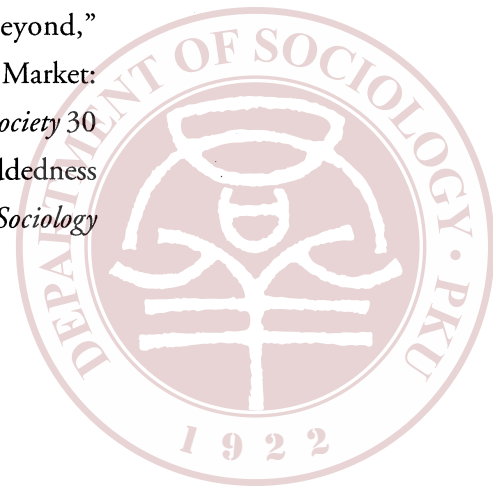


- 11 如前面所指出的，由於 Polanyi 缺乏更有力的理論語言與方法論上的反省，導致他的著作裡，實質命題與形式分析、道德判斷與理論論證都往往會混淆在一起。因此，對於自律市場存在與否，市場社會存在與否，Polanyi 只能時而肯認其存在，時而否定其可能性。換言之，關於論述與實在的迴圈效應，Polanyi 雖然意識到其存在，但是卻無法在理論語言上將這樣效應指出來，這才是 Polanyi 理論的真正困境所在。
- 12 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1985), 481–510.
- 13 從事後回顧的角度來看，Granovetter 的鑲嵌命題之所以能為在社會學內開展出一片“新”局，廣為相關學者所接受，其關鍵點正是在於其“低度社會個人”與“過度社會化個人”的論證，在後 Parsons 的論述空間下，這樣的批判“似乎”有極大的說服性。然而，正如我們在第三部分所指出的，Parsons 的理論困境，並不是“過度社會化個人”的問題，而是在於對於形式分析與實質分析的混淆。Granovetter 這種對於 Parsons 的批判，也導致新經濟社會學相關學者，忽視了 Parsons 從媒介理論(如貨幣)討論經濟體系的運作所具有的貢獻，進而使得新經濟社會學對於經濟現象在系統層次的考量是有所不足的。關於新經濟社會學對 Parsons 理論誤解與忽視，請參見 Jens Beckert, "Interpenetration Versus Embeddedness: The Premature Dismissal of Talcott Parsons in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65 (2006), 161–188.
- 14 這一部份請參考第二部分，關於弔詭一的討論。
- 15 關於鑲嵌命題過於空洞的問題，請參見 Alejandro Portes and Julia Sensenbrenner, "Embeddedness and Immigration: Notes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1993), 1320–1350; Brian Uzzi "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Embeddedness for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Organizations: The Network Effec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1996), 674–698。針對鑲嵌命題過於空洞的問題，相關社會網路論者都試圖利用結構洞、角色理論、社會資本、地位與啄食序列(pecking order)、結構凝聚力(structural Cohesion)等概念來加以修補。關於結構洞的討論，請參見 Ronald S. Burt,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Structural Holes and Good Idea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0 (2004), 349–399。關於角色理論的討論，請參見 James D. Montgomery, "Toward a Role-Theoretic Conception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 (1998), 92–125。關於社會資本的修正，請參見 Alejandro Portes and Julia Sensenbrenner, "Embeddedness and Immigration: Notes on the Soci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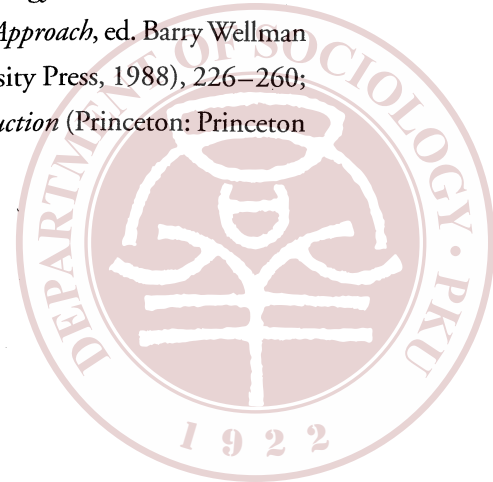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1993), 1320–1350; Ronald S. Burt, “Structural Holes and Good Idea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0 (2004), 349–399; *Brokerage and Closure: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Capit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關於利用地位與啄食序列的討論，請參見 Joel M. Podolny, “A Status-Based Model of Market Competi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1993), 829–872; “Market Uncertainty and the Social Character of Economic Exchang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9 (1994), 458–483; “Networks as the Pipes and Prisms of the Marke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7 (2001), 33–60; *Status Signal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Market Compet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關於結構凝聚力的修正，請參見 James Moody and Douglas R. White, “Structural Cohesion and Embeddedness: A Hierarchical Concept of Social Group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8 (2003), 103–127。然而，這些修正，大致上都是在社會鑲嵌的封閉性與開放性的方向上，引入社會學相關的社會結構概念來使鑲嵌命題具體化，並沒有著力於行動概念的重建（如何從網絡出發，概念化市場交換的行為），因而無助於解開“社會鑲嵌”與“市場交換行為”的弔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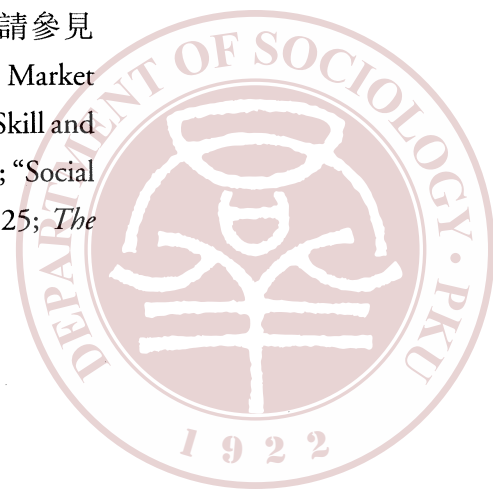
- 16 關於此點，請參見 Walter W. Powell, “Neither Market Nor Hierarchy: 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2 (1990), 295–336; Walter W. Powell and Laurel Smith-Doerr, “Networks and Economic Life,” in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ed.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4), 368–402。基本上，Powell認為，作為形式分析的社會網絡分析取徑，必須跟當代彈性資本主義的網絡生產模式關連起來，並透過政治、經濟制度條件與社會連帶的提問，來提高網絡分析的實質性與歷史感。然而，我們必須指出，這種要求歷史化、脈絡化的理論企圖，事實上已經超過鑲嵌命題所能承載的研究旨趣與內在發展張力。此種政治經濟學與網路分析的結合的提議，亦可參見 John Lie, “Sociology of Marke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3 (1997), 341–60。
- 17 關於鑲嵌命題與 Parsons、Polanyi 理論的比較，請參見 Bernard Barber, “All Economies are ‘Embedded’: The Career of a Concept, and Beyond,” *Social Research* 62 (1995), 387–413; Greta R. Krippner, “The Elusive Market: Embeddedness and the Paradigm of Economic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30 (2001), 775–810; Greta R. Krippner and Anthony S. Alvarez, “Embeddedness and the Intellectual Projects of Economic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3 (2007), 219–2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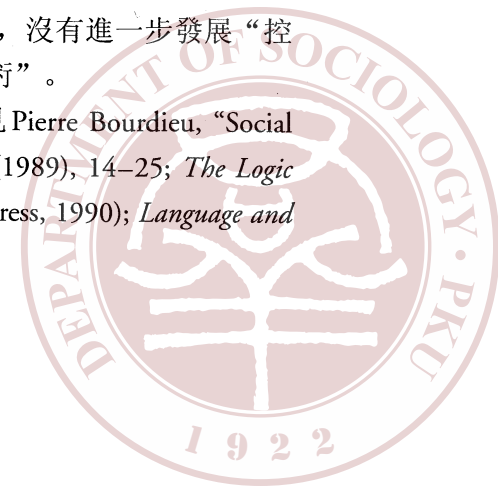
- 18 請參見 Granovetter 與 Krippner 的對談, Krippner Greta R *et al.*, “Symposium: A Conversation on Embeddedness,” *Socio-Economic Review* 2 (2004), 109–135。
- 19 Mark Granovetter, “The Old and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A History and an Agenda,” in *Beyond the Marketplace: Rethinking Economy and Society*, ed. Roger Friedland and A. F. Robertson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90), 89–112;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Socio-Economics: Toward a New Synthesis*, ed. Amitai Etzioni and Paul R. Lawrence (Armonk: M.E. Sharpe, 1991), 75–81; “Economic Institutions as Social Construction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Acta Sociologica* 35 (1992), 3–11; “Problems of Explanation in Economic Sociology,” in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 Structure, Form, and Action*, ed. Nitin Nohria and Robert G. Eccles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2), 25–56; “Business Groups,” in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ed.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4), 453–475; “A Theoretical Agenda for Economic Sociology,” in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Developments in an Emerging Field*, ed. Mauro F. Guillen, Randal Collins, Paula England, and Marshall Meyer (New York: Russell Sage, 2003), 35–60; “Business Group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2nd edition, ed.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5), 429–450。
- 20 關於制度邏輯與制度變遷的討論, 請參見 Roger Friedland, and Robert Alford, “Bring Society Back In: Symbols, 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ed. Walter W. Powell and Paul DiMaggi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232–263。
- 21 關於市場社會學的回顧, 請參見 Marion Fourcade-Gourinchas, “Theories of Markets and Theories of Societ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0 (2007), 1015–1034; Neil Fligstein and Luke Dauter, “The Sociology of Marke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3 (2007), 105–128。
- 22 關於 White 關於此一命題的相關文獻, 請參閱 Harrison C. White, “Where Do Markets Come Fro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 (1981), 517–547; “Varieties of Markets,” in *Social Structures: A Network Approach*, ed. Barry Wellman and S.D. Berkowitz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26–260; *Markets from Networks: Socioeconomic Models of Produ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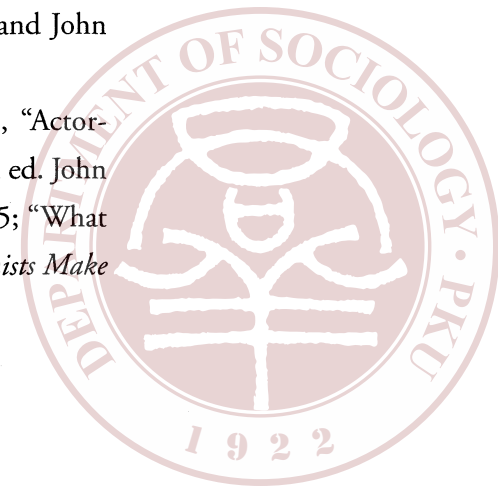
- 23 Harrison C. White, "Interview by Richard Swedberg," in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Redefining their Boundaries: Conversations with Economists and Sociologis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78–95.
- 24 關於這兩種不同觀點的社會網絡分析的討論，請參閱 Joel M. Podolny, "Networks as the Pipes and Prisms of the Marke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7 (2001), 33–60。
- 25 關於關係論的一般性討論，請參見 Mustafa Emirbayer, "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1997), 281–317。
- 26 關於White對於理論議題的討論，請參見 Harrison C. White, *Identity and Control: A Structural Theory of Social A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Social Networks Can Resolve Actor Paradoxes in Economics and in Psychology,"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51 (1995), 58–74; *Identity and Control: How Social Formations Emer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關於White的理論發展的整體簡介，請參閱 G. Reza Azarian, *The General Sociology of Harrison C. White: Chaos and Order in Network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 27 關於White對於社會網絡分析中結構概念的語言學轉向，請參閱 Harrison C. White, *Identity and Control: How Social Formations Emer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 28 Karin Knorr-Cetina, "Capturing Markets? A Review Essay on Harrison White on Producer Markets," *Socio-Economic Review* 2 (2004), 137–147.
- 29 Sharon Zukin and Paul DiMaggio, "Preface," *Theory and Society* 15 (1986), 1–10.
- 30 Fligstein 的理論架構乃是結合了組織新制度與 Bourdieu 的場域理論，所發展出來的政治—文化取徑。所謂的政治—文化取徑是由場域出發，強調場域乃是一個社會空間，在其間的行動者企圖在場域內部生產支配關係，進而生產“場域文化”來定義彼此的社會關係。這種取徑關心的是場域的動態與演進，以及基於場域既有的權力關係，行動者如何認知彼此與定位自己，又如何基於這樣的認知與定位，發展策略與技巧，去改變或維持場域既有的狀態。對 Fligstein 而言，這樣場域理論可以用來概念化市場制度的演進與民族國家的形成。關於 Fligstein 對於政治—文化取徑的理論討論與在市場社會學方面的應用，請參見 Neil Fligstein, "Markets as Politics: A Political-Cultural Approach to Market Institu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1996), 656–673; "Social Skill and Institutional Theor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0 (1997), 397–405; "Social Skill and the Theory of Fields," *Sociological Theory* 19 (2001), 105–125; *The*



- Architecture of Markets: An Economic Sociology of Twenty-First-Century Capitalist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關於政治—文化取徑在政治與經濟議題上的運用，可進一步比較 Bourdieu 對相同議題的討論，請參見 Pierre Bourdieu, “Rethinking the State: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Bureaucratic Field,” *Sociological Theory* 12 (1994), 1–18; “From the King’s House to the Reason of State: A Model of the Genesis of the Bureaucratic Field,” *Constellations* 11 (2004), 16–36; “Principles of an Economic Anthropology,” in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2nd edition, ed.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5), 75–89; *The Social Structures of the Economy*, trans. Chris Turn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5)。
- 31 Neil Fligstein, *The Architecture of Markets: An Economic Sociology of Twenty-First-Century Capitalist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32 Fligstein 利用場域理論發展了關於社會技巧 (Social Skill) 與策略的討論，修正了新經濟社會學與組織新制度論對於施為概念化不足的缺失，請參見 Neil Fligstein, “Social Skill and Institutional Theor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0 (1997), 397–405; “Social Skill and the Theory of Fields,” *Sociological Theory* 19 (2001), 105–125。
- 33 關於現代性下制度性反思的討論，請參見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 34 事實上，在研究美國公司資本主義的歷史轉型時，Fligstien 就注意到了關於公司的定義是不斷地受到相關論述的影響，特別是1970年代以降，美國關於公司的定義，深受經濟學對於“公司不過是契約的加總”、“公司的價值乃是創造股東利益最大化”的想法所影響，因此，他試圖用“財務的控制思維”與“股東價值的控制思維”來刻畫這種的現象。請參見 Neil Fligste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rporate Control*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The Architecture of Markets: An Economic Sociology of Twenty-First-Century Capitalist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然而，Fligstien 雖觀察到這樣的現象存在，並且也駁斥了相關的經濟學理論(如交易成本理論、代理人理論與財務經濟學)，但是，他卻沒有對於經濟論述的干預效果予以深究，缺乏對於經濟論述的“迴圈效應”更理論化的思考，因而，沒有進一步發展“控制思維”已標示出來的象徵暴力的“社會煉金術”。
- 35 關於象徵暴力的“社會煉金術”的討論，請參見 Pierre Bourdieu, “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Power,” *Sociological Theory* 7 (1989), 14–25; *The Logic of Practice*,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Language 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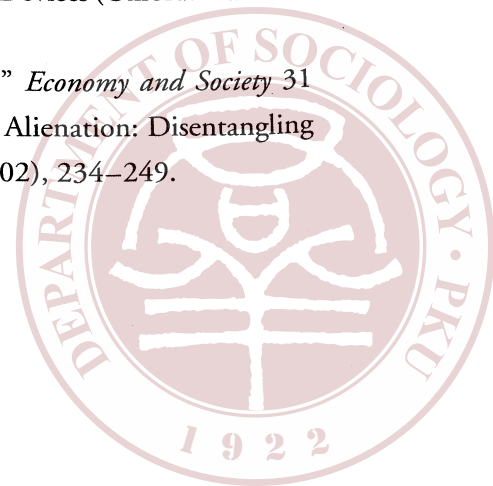


- Symbolic Power*, ed. and intro. John B. Thompson, trans. Gino Raymond and Matthew Adams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 36 關於此點，請參見 Laurel Smith-Doerr and Walter W. Powell, “Networks and Economic Life,” in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2nd edition, ed.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5), 379–402; Thomas D. Beamish, “Economic Sociology in the Next Decade and Beyond,”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0 (2007), 993–1014; Marion Fourcade-Gourinchas, “Theories of Markets and Theories of Societ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0 (2007), 1015–1034; Neil Fligstein and Luke Dauter, “The Sociology of Marke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3 (2007), 105–128。
- 37 除了 Callon 之外，不少由科學社會學出發來研究經濟現象的學者，都注意相關的知識工具與技術物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其中，純粹虛擬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引起了最多的關注。相關的回顧與討論，請參見 Karin Knorr-Cetina and Alex Preda, eds., *The Sociology of Financial Marke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Alex Preda, “The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Financial Market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1 (2007), 506–28; Alex Preda, “STS and Social Studies of Finance,” in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3rd edition, ed. Edward J. Hackett, Olga Amsterdamska, Michael Lynch and Judy Wajcman Hackett (Boston: MIT Press, 2007), 901–921。
- 38 Michel Callon, “Introduction: The Embeddedness of Economic Markets in Economics,” in *The Laws of the Markets*, ed. Michel Call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1998), 1–57。
- 39 Michel Callon, “An Essay on Framing and Overflowing: Economic Externalities Revisited by Sociology” in *The Laws of the Markets*, ed. Michel Call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1998), 244–269。
- 40 Callon 的“表現性”命題（乃至於所立基的“行動者網絡理論”），翻轉了論述與實在的關係，因而涉及了當代社會理論中關於語言學轉向的爭議。事實上，“表現性”這一概念，正是源自於 J. L. Austin 所發展出來的語言哲學。關於此點，請參見 Michel Callon, “Actor-Network Theory: The Market Test,” in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After*, ed. John Law and John Hassar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181–195。
- 41 Callon 自己對表現性命題的進一步討論，請參閱 Michel Callon, “Actor-Network Theory: The Market Test,” in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After*, ed. John Law and John Hassar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181–195; “What Does It Mean to Say That Economics Is Performative?” in *Do Economists Mak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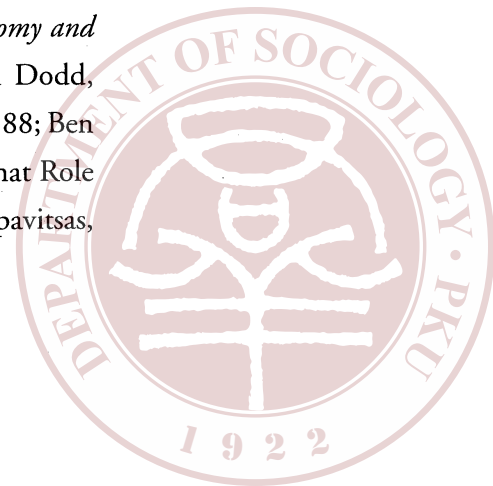


Markets? On the Performativity of Economics, ed. Donald Mackenzie, Fabian Muniesa, and Lucia Siu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311–357; Michel Callon and Fabian Muniesa, “Peripheral Vision: Economic Markets as Calculative Collective Devices,” *Organization Studies* 26 (2005), 1229–1250; “Economic Experimen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rkets,” in *Do Economists Make Markets? On the Performativity of Economics*, ed. Donald Mackenzie, Fabian Muniesa, and Lucia Siu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163–189。至於表現性命題相關的經驗檢測與後續討論，請參見 Donald MacKenzie, “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and the Sociology of Arbitrage,” *Economy and Society* 32 (2003), 349–380; “An Equation and Its Worlds: Bricolage, Exemplars, Disunity and Performativity in Financial Economic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33 (2003), 831–868; “The Big, Bad Wolf and the Rational Market: Portfolio Insurance, the 1987 Crash and the Performativity of Economics,” *Economy and Society* 33 (2004), 303–334; “Opening the Black Boxes of Global Finan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2 (2005), 555–576; *An Engine, Not a Camera: How Financial Models Shape Marke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Is Economics Performative? Option The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erivatives Market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8 (2006), 29–55; Donald MacKenzie, and Yuval Millo, “Negotiating a Market, Performing Theory: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a Financial Derivatives Ex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9 (2003), 107–145; Donald MacKenzie, Fabian Muniesa, and Lucia Siu, *Do Economists Make Markets? On the Performativity of Econom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Daniel Beunza and David Stark, “Tools of the Trade: The Socio-Technology of Arbitrage in a Wall Street Trading Room,”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13 (2004), 369–400; Daniel Beunza, Iain Hardie and Donald MacKenzie, “A Price is a Social Thing: Towards a Material Sociology of Arbitrage,” *Organization Studies* 27 (2006), 721–745; Andrew Barry and Don Slater, eds., *The Technolog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2005); Iain Hardie and Donald MacKenzie, “Assembling an Economic Actor: The Agencement of a Hedge Fund,” *Sociological Review* 55 (2007), 57–80; Michel Callon, Yuval Millo, and Fabian Muniesa, eds., *Market Device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2007)。

- 42 Daniel Miller, “Turning Callon the Right Way Up,” *Economy and Society* 31 (2002), 218–233; Don Slater, “From Calculation to Alienation: Disentangling Economic Abstract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31 (2002), 234–249.



- 43 無論是 White 的社會網絡分析、Fligstein 的場域理論，還是 Callon 的“行動者網絡”取徑，在方法論上都是採取關係論的立場，試圖從社會關係出發，探討施為如何可能的問題，這使得他們避免了 Parsons 或 Granovetter 試圖從經濟行動出發，發展社會結構的理論所遇到的困境。至於，“結構與行動”議題的一般性討論，請參見葉啟政，《進出“結構—行動”的困境：與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論述對話》（台北：三民書局，2000）。
- 44 倘若我們從“控制思維”的象徵暴力面向出發，Callon 的“表現性”命題，事實上乃是一種“社會煉金術”的機制。當資源（物質與象徵）比較多的行動者援引經濟論述時，會對於這些論述所隱含的前提過於理所當然，進而將內建於經濟論述對於“實在的想像”的“控制思維”，“誤認”成實在本身，並且，進一步透過相關社會建制的建構與權力關係的操作，這些“控制思維”衍生為其他行動者因“誤認而認可”的社會實在定義。正是透過這種“雙重誤認”，使得經濟論述會產生規範性的效力，從應然轉變成實然，這才是“經濟論述表現性”的真正機制—透過象徵暴力雙重誤認的“社會煉金術”，產生了論述與實在的迴圈效應。
- 45 關於從社會學理論的角度，對於新自由主義的回應，請參見 Barry Smart, *Economy, Culture and Society: A Sociology Critique of Neo-Liberalism*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2003)。
- 46 前述 Parsons 的舊經濟社會學與 Polanyi 對“鉅變”的思考，兩者都同時注意到現代貨幣經濟在系統層次上運作的複雜性。但是，現代經濟在貨幣、金融、信用等系統層次的運作，卻甚少為新經濟社會相關學者所注意。相關的社會學討論，除了從前面所提到由科學社會學出發對於金融議題的討論，以及由治理術出發的會計社會學等發展外，貨幣社會學相關理論發展的回顧與辯論，請參見 Heiner Ganßmann, “Money — A Symbolically Generalized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On the Concept of Money in Recent Sociology,” *Economy and Society* 17 (1988), 285–316; Wayne E. Baker, and Jason B. Jimerson, “The Sociology of Mone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5 (1992), 678–693; Viviana A. Zelizer, *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 “Fine Tuning the Zelizer View,” *Economy and Society* 29 (2000), 383–389; “Missing Monies: Comment on Nigel Dodd, ‘Reinventing monies in Europe,’” *Economy and Society* 34 (2005), 584–588; Ben Fine and Costas Lapavistas, “Markets and Money in Social Theory: What Role for Economics?” *Economy and Society* 29 (2000), 357–382; Costas Lapavistas,



Social Foundations of Markets, Money and Credit (London: Routledge, 2003);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Money as Universal Equivalent: A Response to Ingham,” *Economy and Society* 34 (2005), 389–403; Nigel Dodd, *The Sociology of Money: Economics, Reason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Global Uncertainties of Mone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7 (1997), 511–523; “What Is ‘Sociological’ about the Euro?” *European Societies* 3 (2001), 23–39; “Reinventing Monies in Europe,” *Economy and Society* 34 (2005), 558–583; Geoffrey Ingham, “Money Is a Social Relation,”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54 (1996), 507–529; “On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the ‘Sociology of Money,’” *Acta Sociologica* 41 (1998), 3–18; “Capital, Money and Banking: A Critique of Recent Historical Sociolog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0 (1999), 76–96; “Fundamentals of a Theory of Money: Untangling Fine, Lapavitsas, and Zelizer,” *Economy and Society* 30 (2001), 304–323; *The Nature of Mone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4); “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 Ontology of Money: Responses to Lapavitsas and Dodd,” *Economy and Society* 35 (2006), 259–278。

- 47 關於從社會學理論的角度對於經濟議題的討論，請參見 Jens Beckert, *Beyond the Market: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Efficiency*, trans. Barbara Harshav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 48 關於市場社會崛起的理論討論，請參閱 Don Slater and Fran Tonkiss, *Market Society: Markets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1)。
- 49 關於此點，請參見 Albert O.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Charles Taylor,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